第一章

引言:儿童也会有哲学问题

本书是哲学概论,其全部内容都在讲哲学是什么,都在为哲学作辩护。除了讲哲学是什么之外,本书还将讲哲学不是什么 除了为哲学作辩护之外，本书还将代哲学作道歉。

所以,我们先不忙着说哲学是什么、哲学有多么重要。这两个问题的确切回答，要等到读者读完本书才能知道。我们在这个引言中要说的是，不管你认为哲学是什么，不管你认为哲学是否重要，你可能早就同哲学打上交道了——至少,早就同哲学打过交道了。

哲学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但在此以前，它已经以神话的形式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期①。有大量证据表明，在人类的进化和人的个体的成长过程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我们身边也常有孩子。因此，在没有条件通过研究人类早期的生活和文化而了解哲学的源头的情况下，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儿童。如果在儿童身上可以找到哲学的萌芽，那就表明哲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或违背我们天性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我们的所在、所是、所作和所思密不可分。

① 关于古希腊哲学和古希腊神话的关系，见 *The Origins of Philosophy – Its Rise in Myth and the Pre – Socratics*, ed. Drew A. Hyland, New York, 197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大哲学家幼时的哲学问题

哲学史不能没有大哲学家，大哲学家不能不思考大哲学问题。有意思的是，一些看上去玄奥莫测的哲学大问题，常常在儿时就已经在他们小小的脑海中盘旋了。

我国南宋时期有两个著名哲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史书上记载了他们幼时的“哲学思考”。据说朱熹小时候刚会说话，他父亲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他父亲指着天说：‘天也。’朱熹反问说：‘天之上何物？”他父亲觉得十分惊讶。关于陆九渊，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陆九渊字子静。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①

天地悠悠，何所穷际，每一个在夏天的夜晚举头望星空的孩子，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尽管“深思”这个问题以至废寝忘食的，只有极少数人。在 20 世纪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也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波普尔说他在 8 岁时不知怎么听人说太阳系和空间是无限的，波普尔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怎么可能想象一个无限的空间呢？但如果空间是有限的，空间外面是什么东西呢？波普尔的父亲建议他去问他的一个叔叔。这位叔叔首先问波普尔是否理解不断延续的数系，波普尔回答说这不难理解。然后他要波普尔想象一堆叠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波普尔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回答，但仍然有些犹豫不决。当波普尔后来成为一名哲学家时，他知道当时他感到的困惑其实涉及潜在的无限与实在的无限之间的区

① 《宋史》卷四三四。

别。说宇宙空间是无限的，谈的是实际的无限，而数系的无限、砖块迭加的无限，则是潜在的无限。能不能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德国哲学家康德著名的4个“二律背反”,第一个就与此有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入讨论。

不仅无限的宇宙，而且小小的海蜇,也会引起未来的大哲学家的“哲学思考”。英国哲学家罗素5岁时，家里人带他到布罗兹塔尔附近的海边去玩，他发现自己无法把礁石上的海蜇弄下来,非常恼怒。于是他问姑姑阿加莎：“海蜇会思考吗？”姑姑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你就应当学习”,罗素说。

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会思考吗？什么叫思考？为什么说动物不会思考？这些起初并不显得是问题的问题，一旦认真计较起来，大有文章可做，一直可以做到这样的题目：升级换代越来越快的电脑是不是真是一种脑——机器会不会思考、有没有思想、用什么办法辨别有思想和没有思想？一门叫“精神哲学”或“心灵哲学”的哲学分支，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不管怎么样,人们都承认人是会思考的(问“人会不会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就是知识。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哲学问题——有关知识的哲学问题。这种问题儿童也可能碰到，因为儿童要学习知识。

11岁时，罗素学习欧氏几何。他非常失望地发现，几何学的基础建立在那些必须相信却不能加以证明的公理上面。他想搞清楚“甲和乙都等于丙,甲乙是否相等”？罗素的哥哥回答他：“要是你不接受这些公理，那我们就讲不下去了。”罗素这才停止了追问——确切些说，暂时停止了追问。长大以后，罗素研究的无数哲学问题中的一个，就是数学的基础问题。罗素是数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一派的主要代表，主张数学的基础是逻辑、可以从逻辑中推演出全部数学，包括几何学。

一种知识无法加以证明，这可以成为一个问题；一种知识可以得到确定无疑的证明，这也可以震撼敏感的心灵。大科学家兼大哲学家爱因斯坦回忆说，在 12 岁那年，他得到了一本书（恰好也是关于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的）。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至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爱因斯坦说：“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①

罗素和爱因斯坦在观点、兴趣和性格上有许许多多差别，所以，更容易拨动他们的心灵之弦的，一个是几何公理的无法证明，一个是几何定理的可以证明。但是，尽管原因不同，结果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感受到了心灵之弦的震动：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惑，一种难以忘怀的惊讶。柏拉图说：“惊奇是哲人的感受，哲学始于惊奇。’② 罗素和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们不仅在年幼时就有了刻骨铭心的“哲人的感受”，而且在成年以后终于使这种“哲人的感受”升华为哲人的智慧。

难怪大哲学家们往往对自己幼年时经历的惊讶津津乐道。爱因斯坦还回忆过年纪更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时，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③

奥地利哲学家兼科学家马赫也有一段类似的回忆：“我四五岁时，第一次从乡村来到维也纳，我父亲带我登上城堡（旧时的城墙),我看见下面城壕里有人,大为惊讶 从我的观点看,我不了解人怎么能到下面那地方，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另有一条可以走到那

① ③ 《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 4 页。
②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5 页。

里的路。”①

哲学家的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探寻“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的东西，就是要指出人们一直都“完全没想到”的“另一条路”。对于这两点，未来的哲学家们在幼年时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

第二节
普通儿童的哲学问题

大哲学家童年的哲学上的早熟或许没有什么典型意义，并不能说明普通孩子身上也存在着哲学的萌芽。但我们自己的童年回忆中难道找不出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困惑、疑问和思考吗？挪威作家贾德以儿童文学的形式撰写的哲学史《苏菲的世界》轰动全球，其读者主要是少年儿童，这说明少年儿童是可以有哲学兴趣的。在这以前，美国一批学者就开始从事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的尝试。他们发现，儿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疑问和思考，恰好也是哲学史上大哲学家们讨论过、甚至正在讨论的问题。儿童具有的这种哲学疑问和思考，是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的很好的出发点。不管我们对这些美国哲学教师进行的儿童哲学教育作何评价，他们对儿童所具有的哲学疑问和思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下面我们从美国学者马修斯所著《哲学和幼童》一书中选择几个例子，来作些说明。

一个名叫蒂姆的大约 6 岁的孩子，一边忙着舔一个罐头，一边问：“爸，我们怎么能肯定所有东西都不是一个梦呢？”

蒂姆觉得自己在忙着舔罐头。他想，如果他现在不是在真的舔罐头，而是梦中舔罐头，他怎么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呢？或许

① 马赫：《感觉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梦中舔罐头的话，他会醒来。但谁知道醒来却实际上不是开始做梦呢？这不就是我国先秦大哲学家庄子的问题吗：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①

我们都认为梦境与实境的区别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婴儿来说并非如此。有一对双胞胎女孩，在很小的时候老大有时会在深夜向大人告状，说妹妹把她的玩具抢走了，非常委屈。大人告诉她这是做梦，是梦里的妹妹抢她玩具，不是真的妹妹抢她的玩具。她起先不知所云，继而似懂非懂，后来便用不着解释了，知道梦里的事情都是虚幻不真的，还常常在早晨起床后津津有味地讲述夜里的梦，像讲故事一样。孩子的这个成熟过程确实发生了，但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们能肯定现在我们不是在做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在谈论‘时间’的含义时也有这种感觉：“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②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梦境的问题也是这样，不问还清楚，一问倒糊涂了。但这种‘糊涂’恰恰是走向更高程度的‘清楚’的起点，因为它不仅仅是糊涂，而同时也是一种惊讶，一种可表达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的感受。对最平常东西的惊讶，常常是形成最重要哲学问题的来源。

一个名叫乔丹的 5 岁小孩一天晚上 8 点钟上床以前问母亲：“如果我 8 点上床，早晨 7 点起床，我怎么知道钟的短针只走了一圈？我非得不睡才能知道吗？如果我稍微离开一会儿，说不定这短针就走了两次呢。”

① 《庄子·齐物论》。

②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242 页。

我们知道钟只要不坏，12 小时只走一圈。这是有规则、有规律的现象。钟是人造的，我们把握大一些——当然也有例外 :卫星发射系统、航天飞机发射计划的延误、失误都表明，对人造系统的运行规则，我们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自然系统的运行规则呢？我们怎么知道它必定遵循某个规律呢？有人说，我们从大量已知的经验中知道，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但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呢？我们睡懒觉的时候，谁知道太阳那天有没有睡懒觉呢？或许一位没有睡懒觉的同学可以作证，那天太阳也没有睡懒觉。但谁能保证太阳明天不睡懒觉呢？明天是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根据以前经历过的事实能不能对未曾经历的事件作出确定的、有百分之一百把握的预见呢？哲学史上这个问题叫做“归纳问题”。18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首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又叫‘休谟问题”;哲学家们至今仍在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个童话故事说小主人公的爷爷有两个名字，免得他丢掉了一个名字。孩子们听了觉得这有点好玩，笑起来了。老师问他们，是否也有两个名字，是不是怕掉了一个。孩子们都回答：“不是，名字是不会掉的！”只有一个名叫亚当的男孩不这样想，而是问“:如果你忘记了名字,怎么样呢 ?”意思是,忘记了名字,也就是丢掉了名字。一名叫杰妮弗的小女孩瞪了亚当一眼，说：“那你可以去问你的哥哥呀 !”亚当并不满意于这个办法“:如果他也忘记了我的名字呢 ?”意思是,如果我和大家都忘记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不是掉了呢？杰妮弗给问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显然，孩子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手绢之间的区别。自己的手绢要放好，不然就会掉了，找不到了。可自己的名字用不着放在口袋里，只要记住就行了。而且，名字不仅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要不然自己忘记了，就没有别人告诉自己了。问题是，如果别人和自己一样也都忘记了呢？这名字是不是没有了呢？名字

是一种符号,孩子们所碰到的,正是关于符号的性质、作用、起源等等的哲学问题。哲学中有一门学科叫符号学，专门研究有关符号的问题。20 世纪的哲学家们特别关心语言的哲学问题，或者从语言的角度理解传统的哲学问题。小亚当想要弄明白的问题，也正是语言哲学家们要弄明白的问题。

一个叫伊安的小孩家里来了客人，其中包括 3 个孩子。他们爱看的电视节目,伊安不爱看,而伊安爱看的节目,那 3 个孩子不爱看。他们人多，伊安只好让给他们看。可他很委屈，对妈妈说：“妈妈,为什么 3 个人自私就比一个人自私好呢？”

资源多半是有限的，包括时间、机会等等。于是就要进行分配。那么，什么样的分配才是公平的分配呢？多数人的需要一定要高于少数人的需要吗？有没有一种分配标准是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没有必然关系的？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行动或制度的善恶、好坏呢？伊安虽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却已经涉及了哲学当中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样的分支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除了以上例子，我们还可以从身边孩子那里发现哲学问题。比如有一个孩子问她爸爸：“为什么花蝴蝶好看，毛蝴蝶不好看？”爸爸回答说“:因为你喜欢花蝴蝶,不喜欢毛蝴蝶。’孩子对这个回答不满意：“那要是我喜欢毛蝴蝶，它就好看了？不对，还是不好看。’爸爸说“:那大概是因为花蝴蝶是彩色的,毛蝴蝶则不是彩色的。”小孩对爸爸的这个回答似乎更满意一些。

从美学上说，有人认为美是客观的：一个东西之为美，是不管有没有人觉得它美的。有人认为美是主观的：一个东西之所以为美，是因为人作为鉴赏者觉得它美。有人认为美在形式（色彩、线条、节奏等等),与它的内容、与人的需要没有关系。也有人认为美在功利，在于它服务于主体及其社会的一定需要。到底美在何处？小孩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儿童也会有哲学问题，可见哲学离人们的天性不远。

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问题呢？

思考题：

1. 你小时候有过似乎同哲学有些关系的困惑、疑问或想法吗？
2. 小孩也可能有哲学疑问，从这儿你能看出些哲学的特点吗？
3. 你的同学、亲友对哲学有哪些看法？你自己过去是怎么看的？现在又是怎么看的？

参考文献：

1. G.B. 马修斯：《哲学和幼童》，三联书店，1992 年。
2. 卡尔·波普尔："童年时代的一个哲学问题"，见卡尔·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 爱因斯坦："自述"，《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83 年。
4. 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萧宝森译，作家出版社，1995 年。

第二章

什么是哲学问题？

每一门学科，都是对有关问题的回答。问题有无数种，哪些问题我们叫做“哲学问题”呢？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涉及宇宙、人生和文化的最基本的方面。哲学问题，就是关于宇宙之谜、人生之谜和文化之谜的最一般的问题。

第一节
宇宙、人生和文化之谜

人生活在茫茫宇宙，自然而然地要去熟悉和理解这个家园。“天之上何物？”“天地何所穷际？”，朱熹和陆九渊幼时提出的问题，也是人类从其童年起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宇宙的范围、构成、来源、规律和意义等等，是对人类具有永久的魅力的宇宙之谜。“黄浦江的水是咸的还是淡的？”“水的分子结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问的只是宇宙中某个具体事实，或某条一般规律，但“水是万物的起源吗？”“宇宙有开端吗？”则是就整个宇宙发问，它们超越我们能具体指出的东西。朱熹的父亲指着“天”对幼年的朱熹说：“天也。”这时所讲的“天”，还是具体的有形有象的东西。朱熹不满足于父亲的这个解释，进一步追问道：“天之上何物？”这就是作哲学的发问。屈原的《天问》，把幼年朱熹的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形象了：“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①

“天之上何物”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追求对特定对象的外在的超越，即在空间上超越，而真正的宇宙之谜在于对任何特定对象，包括被看做是无限的宇宙的内在的超越。这就是说，我们的眼光不放在宇宙之外或宇宙之上，而放在宇宙的深处、宇宙的背后：可以从哪些角度和方面来把握宇宙？宇宙间有什么普适万物的内在规律、构成？甚至，宇宙有什么意义、目的？

当我们这样提问时，我们假定了宇宙是可以把握的，宇宙中是有规律、甚至有意义的。但对这个假定本身也可以提问：“这宇宙是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吗？”

不管怎么样，上面的问题都在对整个宇宙进行发问，对整个宇宙有所言说。有的人以为这宇宙是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是可以说出其来源、规律、构成和范畴的。说这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的，就像说这世界是水做的、泥捏的或无形无象的‘气’聚集而成的，都是表明这世界是可以把握的。有的人认为这世界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言喻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②。甚至只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方能‘同于大通’、“与万物一体”。③ 但这实际上也承认有一个统一的道，而且，说‘道’不可言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言说；说宇宙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也是在谈论宇宙之谜。

在爱因斯坦看来，最不可解的宇宙之谜，是这宇宙居然没有不可解的谜：“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便是这世界是可以思议的。”广阔无垠的宇宙，丰富至极的宇宙，居然可以用一些像 $E=MC^2$ 这样的数学公式来把握，岂不怪哉！岂不妙哉！

对这样一个谜，爱因斯坦求助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来“解

① 《楚辞》。
②老子：《道德经》。
③ 《庄子·大宗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答”。斯宾诺莎承认一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爱因斯坦说他也相信这样的上帝；宇宙之所以可以理解，是这样一位上帝使其然，对此我们平凡之人不得狂妄，而必须敬之畏之，尽我们之所能来揭示上帝为宇宙设下的种种谜底。对宇宙之谜的敬畏之情，成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史诗般思想旅程的最宝贵的向导和动力。

哲学问题的另一个大类涉及人生之谜，问的是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准则。当我们问“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人天生就有体质差别吗？”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人和其他动物看做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人还只是一种生理的对象。但当我们问“人天生就有智力差别吗？”的时候，人的特点出现了。人和动物不同，因为人和动物在智力上有质的不同：人有理性，人会思考。当我们问“人天生就有道德差别吗？”的时候，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尤其明显。只有人才谈得上“善”与“恶”，只有人才永远也不能仅仅当作手段。老年人，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或许可以认为已成了社会的负担。但是，当一位老年人的生命面临歹徒威胁的时候，即使是一个正当盛年的大科学家，也不能为顾惜自己似乎更有价值的生命而袖手旁观。

那么，为什么人的生命那么珍贵呢？一种解释是，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造成的，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上帝更重要。后来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人甚至认为与其说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不如说是人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人的生活为什么值得过呢？……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既然人的生命那么珍贵，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时候却应当奋不顾身、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呢？“此”“义”“此”“仁”的内涵是什么、根据是什么？

谈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读过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人，一定记得其主人公的那段著名独白：

“生存还是不生存 就是这个问题：
是在心里忍受那无情命运的
横飞逆来的打击更为可贵呢，
还是面对着海洋一般的无边艰难，
操起武器,用反抗来把它们消灭呢。”

用法国哲学家兼作家卡缪的话来说，哈姆雷特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①在卡缪看来，生命的意义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 3 大领域,精神世界有 9 种或 12 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游戏而已。人们是在什么时候最深刻地、最深切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在像哈姆雷特那样考虑要不要由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在考虑自杀的时候。“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②因此,卡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③

深刻的哲学智慧，往往是以片面的、甚至荒诞的形式出现的。把自杀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固然是过分的。但自杀问题的核心确实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哲学中也确实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李大钊、陈独秀都写文章讨论过自杀的问题。哲学家中高寿的极多，但曾经有过自杀念头的也不少，这大概和哲学家特别喜欢思考生命的价值有关。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一位硕儒,他于 1927 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对此人们有各种解释，但他在人生观上的思考显然是一个因素。王国维自称‘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④ 为此他求助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并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但他同时又受到科学和重视科学的一些哲学派别（实证论、快乐论、经验论）

①②③ 卡缪:《西西弗斯的神话》,三联书店,1987 年,第 2、5、2 页。
④ 《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第 469 页。

的影响，认为它们更可信。于是他留下了这样一段传世名言：

“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知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然，如果认真地思考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就会导致自杀，那我们说不定还不如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至少大部分人会这样想。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说，也决不能让自杀成为普遍现象。但幸好，对生活价值和意义的严肃思考会有不同的结果。照苏格拉底的看法，恰恰只有经过严肃考察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过的。马克思在 17 岁的时候，就认定“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② 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人生观远远没有那么乐观，其思想和性格的悲观主义色彩可以说与王国维不相上下,但他临终时却对看护他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听到这话，维特根斯坦的一位学生说他感到既神秘莫测，又感人至深。③

这感人的秘密，或许可以用英国 19 世纪哲学家约·斯·穆勒的一句名言来解释：

> “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低比做一个傻子好。万一傻子或是猪看法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个问题的他们自己的那方面。苏格拉底一类的人却知道两方面。④

① 《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第 471－4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7 页。

③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90 页。

④穆勒:《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10 页。

哲学问题的又一个大类是关于文化之谜的哲学问题，问的既不是人之所在(即宇宙),也不是人之所是(即人生),而是人之所作(即文化)。“文化”一词有无数定义,最广泛的一种便是“人之所作”:人造之物。

人造之物是与自然之物相对而言的。人是自然的产物，从这点来说，人也是“自然之物”。但人这个自然界进化最高阶段的结果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不满足于享用别的自然产物，不满足于接受自然界常常是非常吝啬的馈赠。于是人就必须按自己的需要创造出自然界中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但人又不能无中生有地进行创造；超越自然的前提是服从自然、利用自然。通过人的活动，人的需要和目的具有了现实的形式，这可以说是人的自然化，而自然的材料被打上的人的烙印，这可以说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人所创造的文化可分为三类：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器物是指占据空间的、有物理形态的人造之物。从其存在形态而言，器物和自然之物没有区别，服从各种自然的规律。再先进的工具和消费品，也都是以自然之物为我所用，风吹日晒，水淹火燃，都会使其慢慢损耗，或瞬间毁灭。尽管如此，作为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器物与单纯的自然物有本质的区别。桌上的这台电脑是经不起锤子敲打的，因为它的物理形态使其服从力学原理。但电脑的制造是利用了许许多多客观规律，也体现了人们的需要和目的；许许多多本来分别存在的客观规律在人的需要和目的统率之下统一、协调起来，构成了制造电脑之理。锤子能敲碎的只是这台或那台电脑，而不是制造这台或那台电脑的原理。器物之中体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的目的和客观规律的关系，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

与器物文化不同，制度文化表现为风俗、礼仪、政治法律制度

等等。它们虽然有客观的存在，但这种客观的存在是不可能仅仅通过外在的观察而了解的，也是不可能用物理的指标来衡量的。像马车、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是占据空间，服从自然规律的，但马车、汽车在行驶时所遵循的交通规则，虽然一经颁布就具有了客观意义,但这种“客观意义”显然和马车、汽车之存在的“客观意义”大相径庭。假定一个从来不知道交通为何物的外星人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车在马路上开，他会观察到汽车的形状、速度，以及汽车遇到红灯就停下，遇到绿灯就行驶等情况，但他能说这里存在着交通规则吗？很难，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每辆汽车都遇到红灯就停，那些遇到红灯不停的汽车或许是因为有特别许可（如救护车、消防车等），或许是因为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不事先对交通规则有所了解，是无法仅仅从观察交通行为得出交通规则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观察者可能把碰巧与红绿灯开、关同时出现的某种其他事件（如风力大小）当作与汽车停驶和行驶有关的事件，从而作出错误的解释。即使观察到确实在红灯和汽车停驶之间有确定的联系，他也可能以为红灯和绿灯有一种对汽车进行遥控的功能，从而把交通规则的作用理解为物理力量起作用的结果。如何从理论上说清楚制度、规章、法律等等的客观性、有效性,它们同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也是哲学上的重大问题。

离人们的直观最远的是精神文化,即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等等。这些精神文化虽然离不开物质载体，但更重要的是所载之物，即意义和价值。“意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但什么是“意义”自己的意义？对此哲学要进行研究。关于价值，也有专门的哲学研究，那就是价值论或价值哲学。有各种不同的价值。我们说科学理论是真的，道德行为是善的，艺术作品是美的，宗教体系提供一种超越真善美、同时又包容真善美的价值。这“真”、“善”、“美”的含义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真的科学理论、善的道德行为、美的艺术作品等等，其评价依据、评判程序是什么，

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

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处于什么关系，也包含着许多哲学问题。历史学家用人们使用的工具来称呼早期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用工具来划分近代以来的历史时期不大普遍，但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所谓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计算机时代等等。这充分表明器物文化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有人认为对于人类历史的分期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规范性结构’即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规范的进化，有人认为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进化，甚至艺术的进化、宗教的进化。这些观点都涉及如何看待上述 3 种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哲学中，宇宙之谜、人生之谜和文化之谜互相联系着。

宇宙之谜一定是以文化为媒介和背景而提出和探索的。要理解屈原的《天问》、斯宾诺莎的‘理性的上帝’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必须联系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宗教和科学活动，以及他们对这些文化类型的理解。

文化之谜也离不开宇宙之谜。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和自然（宇宙）的关系是文化之谜的核心，而且是因为对宇宙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对文化的看法。爱因斯坦之所以坚决反对对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的理解，是因为他坚信上帝不“掷骰子”。黑格尔之所以认为只有艺术才具有美的价值，是因为在他那里自然界与理念的自在自为状态尚相距遥远。

撇开了文化之谜和宇宙之谜，人生只能具有心理学上的甚至生理学上的意义。人和动物一样要觅食果腹、筑巢栖身。但人的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所以人会讲究饮食文化、居室风格。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顺其自然，有的人精心盘算，有的人是为了服务社会，有的人则追求‘天人合一”，各自都赋予自己的活动以各自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同文化甚至宇宙的自觉的关系把人的生活和动物的生活区别开来了。另一方面，哲学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